



JINCHENG NONGMINGONG WENHUA RENGE DE SHANBIAN

进城农民工 文化人格的嬗变

◎张乐天 徐连明 陶建杰 等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JINCHENG NONGMINGONG WENHUA RENGE DE SHANBIAN

进城农民工 文化人格的嬗变

徐连明 陶建杰 等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张乐天,徐连明,陶建杰等著.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628-3074-0

I. ①进… II. ①张… III. ①民工—人格—研究—中国 IV. ①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7756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

著 者/张乐天 徐连明 陶建杰等

责任编辑/严国珍

封面设计/戚亮轩

责任校对/张 波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200237

电 话:(021)64250306(营销部)

传 真:(021)64252707

网 址:press.ecust.edu.cn

印 刷/常熟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14.5

字 数/338 千字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628-3074-0/C·161

定 价/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出版社营销部调换。)



序：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

2008年前,我们在上海城市空间打开了一扇窗,观察或清晰或模糊的进城农民工这一群体,注视他们匆匆远去的脚步,聆听他们或喜或悲的倾诉,记录他们平凡却精彩的故事,思考、理解并描述他们进城以后文化人格嬗变与重建的轨迹。于是有了下面这些文字。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为我们这些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创造了观察、接触和解读进城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机会,在与进城农民工的互动中,每一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体验,这些不同的体验对于多角度理解进城农民工是重要的。因此,本书不求统一,而尽可能保持参与研究人员的原有的思考与风格。本书不求提出一套完整的分析,为的是留下能让读者反思的空间。

一、农民文化人格概览

人格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派生于拉丁语“面具”。早在中世纪初期,托马斯·阿奎那已经用这个词表示了人生存在的条件或方式。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说:“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人格。”马尔库塞认为,“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这就是说,人格是一定文化的折射,人格建设实际是文化理想的构造。但是,就如许多最常见的概念很少有一个大家认同的定义一样,有人曾经研究说,到21世纪初期,人格概念至少有超过100种不同的理解。在这里,我们把文化人格理解为:人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和在内心体验过程中流露的主导倾向,包括个体建构生活的信念、价值判断的标准、为人处世的态度、修身养性的习惯等。

19世纪30年代,美国曾诞生了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人以人格与文化变迁为主题,探求个人人格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概括由此形成的“文化模式”。文化与人格学派超越了更多强调本能的基本人格观,重视社会与文化对于人格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样的视角看,文化人格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并对文化作出反应的结果;文化塑造着具体的人,人的实践也不断地创造着文化。文化人格看不见、摸不着,它只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的那些品格,在人的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中表达出来的那些特质。因此,唯有在人的生存环境中、在人的实践展开中、在人的交往与互动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体察文化人格。

中国地域辽阔,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生产长期维系着绝大多数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村的生存环境塑造了农民的文化人格,这种区别于城市居民的文化人格成为我们理解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的起始点。从总体上说,农民的文化人格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依附性。传统农民使用落后的农具耕种小块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的不可流动性把农民束缚在村落里,限制在狭窄的社会空间中;自然界的恢弘、博大、不可知、难预测,人生的无常、灾难,让农民们常常祈求祖荫的庇护、菩萨的照应。农业劳动十分艰苦,很多农活需要大家的协作,战胜自然灾害更仰仗于宗族、村落甚至更大范围的合作,这一切使每一个农民都不得不依附于宗族、村落。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农业经营制度没有改变传统



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也没有改变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公社在双重意义上导致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更带有依附性,一方面,公社切断了农民本来就很少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特别是经济的联系,使得农民更多地依赖于土地,依赖于村落;另一方面,公社以其制度设计与承诺为农民提供了生活的保障,形成了农民有困难,找集体、找政府的情况。

在传统村落里,现实生产与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是生存的需要。这种相互依赖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断地形塑着个人的文化人格,造成了农民文化人格中的依附性特点。本来,农民中也有一些人追求独立的人格,但是他们在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中不得不依赖于他人,例如,在传统的车水劳动中,再强壮的农民也需要与其他三四个农民结成合作的团队,否则就一事无成。而一些青年农民的“强出头”行为最终大多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都给村里的其他人一种警示,告诫农民们,依附性的行为是安全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联民村一带的不少农民反对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们的议论令人惊讶:“生产队里大家一起干活多好,我们每天都不需要动脑筋,队长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叫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现在分田到户了,有很多活还真不知道怎么做了。”

其二,保守性。数千年来,农民们世代代与自然界“交往”,积累起复杂的应对自然变化的经验。传统农业生产经验与现代农业技术完全是两回事。传统经验缺乏效率,缺乏应对较大自然灾害的能力,几乎没有内在的更新机制。更重要的是,传统经验口口相传,模糊而不定型,充满着智慧与复杂的应对策略,也包含着“违规”的训诫,例如,俗话说,“晚稻插秧不过立秋关,过了立秋关,产量减半”。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们最安全的行为是服从“古训”,听从经验丰富的老农们的教导。传统的农业系统本来就十分



脆弱,经不起自然界的變化。旱了、涝了、冷了、热了、病了、虫害来了,这些都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伤害。谁敢违反“老法”自说自话呢?谁又凭什么可能自搞一套呢?20世纪40年代末,联民村一带推销了一批德国进口的化肥,但是,农民们都不敢用,他们怕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害死了庄稼。

传统村落的社会生活也形塑着农民们趋于保守的文化人格。村落里的生活是循环的,24个节气勾勒出生活循环的轨迹。浙北的农民们过了立秋就盼着鬼节,过了冬至就期待着春节,这种生活中的希望只是为枯燥的循环添点油、加点醋而已。村落里的生活是封闭的,农民们除了自然村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几乎没有其他信息的来源;除了看到那些庄稼、那些猪羊,看不到其他东西。家庭主人们常上街去“走一圈”,本想走出封闭的家门去了解点外部世界的故事,但街上除了家长里短,也只有些道听途说的传言。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要求农民们“站在屋檐下,看到天安门”。但农民们“看到”的天安门只是每天广播里描绘的那个刻板形象。

其三,从众性。农民的从众性一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某户农民在结婚的酒席上新加了“燕球”,其他农民的结婚菜单上便也会仿效地写上“燕球”;某户农民造房子用了竹檐子,其他农户也会学着用竹子替代木料做檐子;某户农民做小五金赚了钱,村里很多人家都会置起冲床;如此等等。为什么传统农民不爱独闯而偏好从众?答案可以在农民们的村落生存空间与活动场景中寻找。传统的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在熟人们的“眼皮底下”。假如某人的行为有些“出格”,他就可能被品头论足,被说三道四。这种村落文化气氛给他造成的压力,会迫使他像众人一样行为。另一方面,村落里的农民们都寻找着发展的机会,但是,农民们不仅缺少机会,由于信息稀缺、文化程度低下,他



们难以创造机会。这样,村里某人做某事发财了,他的做法就会吸引农民们的目光,大家就会争相仿效。

当然,农民们从众过程中的攀比也值得关注。村落里的农民们从众,但也都想在有限的空间中争取优势地位,这种情况造成了从众过程中的变化,在农民们的消费领域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婚丧喜事的酒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好,这其中除了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改善以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每一个后来设宴的农户都想超过以前的农户,以使自己更有面子。联民村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了第一轮住房的住房翻建,到 70 年代末,农民们建造的平房越来越高。通常,较晚建房的农户都比较穷,但是,他们一个个都以“屋脊高、气派大”来显示自己的尊严,为自己争回面子。

其四,伦理性。在自然村落里,所有的人都以叔叔、伯伯、寄娘、寄爹相称呼,人们的交往十分注重人情、面子、礼尚往来。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互动建构出村落生活的画卷,具体的个人关系支配着村民们的行为。这一切不断地塑造着农民文化人格中的伦理性特征,也不断地维系着村落的伦理秩序。

1949 年以后,激烈的反传统运动破坏了伦理传统,“四清”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不仅彻底地清算了传统,还试图以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农民,建构农民的集体主义的文化人格。但是,新的文化人格总是伴随着新的生存方式才可能出现。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们仍然生活在传统农村的小世界中,怎么可能产生新的文化人格?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人民公社中不可能产生集体主义的文化人格。进一步说,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政治的社会分层、阶级与阶级斗争、政治的意识形态,这一切构成了那个时代的表述性现实。表述性现实也是真实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影响着农民们的行为方式与生活选择,迫使农民们部分地从传统



的伦理秩序中脱嵌出来,出现了奇特的集体生活表象下的个体化。但是,这种个体化也只是部分的,村落生活的存在支持着传统农民文化人格中的伦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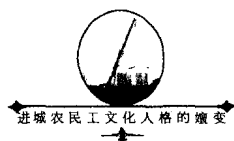
上述关于农民文化人格的论述为我们理解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但是,如果我们的讨论仅仅停留在这里,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我们从下述的分析中将会看到,农民文化人格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

农民的文化人格与社会时间相关,其中,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改革开放打开了村落的大门,无数农民走出了村落,到附近的城镇、到远方的城市;外部世界的信息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话的开通,如洪水一般涌入村落,让村落成了现代世界的一个部分。因此,与毛泽东时代村落里的农民相比,改革开放以后出生、成长起来的农民经历了不一样的社会化过程,他们因此也会形成与他们的先辈们不同的文化人格。农民的文化人格也与社会空间相关。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从海南的热带雨林到黑龙江的黑土地、从新疆的草原到长三角地区秀丽的江南水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各有一方人的文化人格。

最后,文化人格实际上是一个具有鲜明个体特征的概念。走进联民村,走进任何一个普通的村落,我们都会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农民,他们有着各自的气质、习惯、风格、秉性,从而有着各自的文化人格。我们理解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得先从了解一个个具体的人开始。

二、脱嵌与文化人格嬗变的多样性

理解进城农民工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进城”。农民们离开了他



们世代居住、劳作与生活的村落，走进了陌生的城市，随之一切就如魔术般地发生了变化。

本来，村落是他们的家。他们嵌入在村落中，村落形塑了他们的文化人格。现在，他们“脱嵌”了。他们离开了世代生息的土地，告别了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远离了熟识的房屋、树木、河流，还有那熟悉的乡音、村落。他们来到陌生的城市，不得不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脸。农民们进城了，进城本身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恰恰正是这种生存环境的改变，挑战着他们在家乡形成的文化人格。面对全新的生存环境，他们或兴奋或沮丧、或顺从或抗争、或适应或逃避，但是，为了生活下去，他们总要每天去应对，也总要或多或少地改变他们自己的文化人格。

其一，生活信念。进城农民工在自己出生的世界里完成了社会化过程，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信念。我们注意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工们的生活信念是不相同的，但是，一旦他们来到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他们原来的生活信念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冲击。一般而言，进城农民工的生活信念更多带有传统的色彩，他们的家庭世代代的生活方式的延续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们，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自然传递的生活信念让他们可以坦然地生活下去。但是，进城的经历让他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有着许许多多与他们不同的“活法”，许许多多似乎活得比他们快乐、幸福。更重要的是，城市人的生活信念更多的是个人成就型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去争取成功、争取荣耀、争取个人的幸福生活。进城农民工一旦进城，他们每天都会与城里人接触，城里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必定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农民工们。

其二，价值判断。假如农民们不进城，他们的价值判断是清楚



的,甚至不容思索的——在一种稳定的文化环境中,价值判断是自然作出的,每个人在每一种特定的情况下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但是,农民们一旦进城,让他们感到迷惑的是,不仅在许多情况下,城里人的价值判断与他们不一样,而且更麻烦的是,不同的城里人的价值判断标准似乎也不一样。不仅如此,城里人还在日日冲击着他们从媒体中发现的让他们眼花缭乱的不同的价值观。

其三,为人态度与方式。当一个人生活与工作在他从小长大的环境中的时候,他熟知周围的人们,熟知与他人交往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何对待他们,如何与他们互动。但是,进城让他脱离了熟知的环境,他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与他熟知的环境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这时候,他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对待陌生人。另一方面,农民们进城以后,传统的那些东西,例如孝道,是保留着,还是发生了变化?进城农民工在处理亲戚、朋友等关系时如何行为,人情在人们行为中的权重有变化吗?面子是否仍像以前那样时时处处影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进城农民工们如何“找对象”?如何处理个人、恋人、家庭中的问题?这类问题都时刻摆在农民工们的面前,他们不得不及及时应对。

农民们从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来到上海,来到一个迥异于他们家乡的国际大都市。密集的车流、拥挤的人群、满目的商品、眼花缭乱的广告、鳞次栉比的高楼、难懂的口音、随处可见的电视屏幕,大上海的一切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冲击着他们的感官,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考验着他们的心灵。乡村生活似乎已经远在天边,喧哗替代了宁静,紧张替代了松弛,全新的生活将从这里展开。

但是,城市生活的展开充满了艰难曲折。城市需要农民工,却没有为农民工们的到来准备好最起码的条件,就如一个家庭需要



保姆,却没有一间保姆房。

或许是乡村艰苦生活的磨砺,或许是悠远历史传统积淀的智慧,进城农民工们的顽强、执著、坚韧、聪明、策略、机智、应变都令城里人感叹。有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有的只是藏在贴身口袋里的那区区 100 元钱;有的农民工闯荡过一个又一个城市,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只是想“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更有太多的进城农民工一次次地换工作,一次次地搬家,有时简直“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此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进城农民工开始体验城市生活的酸甜苦辣,洞察陌生人的喜怒哀乐,品尝成功或者失败的结果,欣赏大把大把轻易得手的钞票。

这一过程恰恰正是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的过程,假如我们从进城农民工个人生命史与城市的关系去观察,三种态势反映了他们文化人格嬗变的三种重要方式。

态势之一是强势与弱势,即强势的上海文化改变着弱势的进城农民工的文化人格。从总体上说,城市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乡村文化是弱势文化。这种观点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是从当下看,城市文化吸引着更多的民众;二是从历史进程看,城市文化可以更多地替代乡村文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只是城市文化改造农民工原有的文化人格的过程。研究表明,文化的多元性、人们生活选择的多样性、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的流动性,以及城市文化本身的不断变化,使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呈现复杂的、多样化的特点。有趣的是,这种复杂的、多样化的特点恰恰使城市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毫无疑问,许多进城农民工被强势的城市文化征服,征服的方式带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来自温州的李先生基因中就潜藏着温州人做生意的 DNA,最初的打工经历更磨砺了他的意志,家庭经商



的网络也使他有着比其他打工者更多的社会资本。到上海以后，经过努力打拼，他成功了。然而，与他艰苦的创业历程相比，一次不经意的“心动”经历却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他文化人格嬗变的闸门。那一天，一位客户带着年轻漂亮的上海老婆走进了他的接待室，他们品茶、交谈。客户的话语、客户妻子的举止深深地触动了李先生，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怎样做一个上海人。此后，李先生变了。他从里到外都穿上了名牌，他到外面去“花”漂亮的姑娘，最后，他决然地与刚刚生了儿子的“乡下老婆”离婚。现在，他成了上海人的女婿，再也不可能回到温州去过曾经的那种“单调的生活”。

与李先生相类似，也是城市经历中的一个事件，开启了小陈文化人格嬗变的过程。不过，小陈的事件比李先生严重得多。小陈经人介绍来到上海贩卖“打口碟”，开始时生意不错。性格开朗的小陈天天笑嘻嘻地与上海人交往，成了交往圈中、社区里的活跃分子。但是，那个夏日傍晚激烈的敲门声，彻底改变了小陈的性格。那天，他的家被抄了，家里所有的“打口碟”全被没收，他的生意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处处小心翼翼，时时提防着每一个人。

态势之二是融入与塑造。如果说前一种态势下的进城农民工只改变着他们自己，被动地适应城市文化，那么在这里，进城农民工在积极融入城市的同时，也在反思、在创造、在改变着上海的城市文化，他们文化人格的嬗变陪伴着新的城市文化的塑造。

来自四川的刘兴知道，要想在城市站住脚，关键在于掌握一门技术。他没有钱参加技术培训，饭店里的厨师为了保密甚至不让他走进厨房，但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刘兴学习厨艺的智慧、毅力令人感慨。在清真饭店打工的四年时间里，他只要有机会，就会“远远地看”厨师烧菜的工序，并在心里默默地记下这些工





序。他悄悄地记下了烧菜用的各种调味品,认真地背熟调味品的作用,熟识调味品搅和以后可能产生的各种味道。每天回家后,他不顾一天的劳累,练习“刀功”,观察火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从来没有做过厨师的他竟然在一次正式厨师的招聘中被录用为主厨。后来,刘兴自己开了饭店,他受到了上海人的欢迎。

像刘兴一样,进城打工的黄先生也十分注重学习,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交了许多上海朋友,在维修服务中处处受到上海客户的称赞。有一次,他去帮助一个老太太修理热水器。一只简单的配件坏了,本来应该可以修好,他却给老太太换了一个新的配件。修理结束以后,他告诉老太太,要 300 元。没有犹豫,没有讨价还价,老太太从一层层包着的手绢里拿出 300 元现金。黄先生看着老太太的有点儿颤抖的双手,心被触动了。这件事情深深地影响了他,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断地想自己在什么地方还做得不到位。他不时与老太太联系,希望能够通过对老太太的关心来弥补过失。这是一件小事,从中却可以看到,黄先生正以自己的实践创造着城市的反思精神,甚至净化着城市的道德。

态势之三是区隔与建构。通常人们认为,城市文化熏陶下的文化人格具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展示着现代性,预示着未来的趋向。进城农民工来自乡村社会,他们进城以后,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会改变自己的文化人格,更多地接近于城里人。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是全部真理。文化人格的复杂性需要我们摒弃单向思维模式,看到文化人格嬗变的不同路径与多种可能性。农民工进城以后出现的区隔现象使我们看到了文化人格嬗变的复杂性。

文化区隔的形成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区隔”粗略地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被动的区隔,另一类则是主动的区隔。在复旦大学北面有一个进城农民工聚居的地方,叫叶氏路弄堂,



若要描述叶氏路弄堂的情况,首先就要用“拥挤”二字。一扇门推开,里面却住着两家人。房屋条件很差,没有卫生设施。自来水好几家人家共用。屋内随处可见缠绕在一起的电源线和插头。墙壁早已破损,住在里面的人用外面捡来的广告、海报来糊墙。弄堂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晴天沾一身灰,雨天沾一身泥。

住在这里的农民工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说,他们安顿在这里,也是没有办法。他们可以融入城市,但却实践着自我区隔。复旦大学南面的一条小马路边开着一家水果店。二十多年来,袁老伯全家起早摸黑,苦心经营,生意不错,也一直与周围的居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袁老伯就是不喜欢上海,全家说着山东话,吃着山东菜,什么都是山东的好,总想“再过几年回山东老家”。来自贵州农村的安迪刻苦学习美容技术,他的手艺也高人一筹,但是,他却偏偏不愿意留在上海,硬是计算着回贵州的日子。小王夫妇来自安徽,他们把自己的花店打造成一个独立的世界,让我们感慨万分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许多上海青年更小资,在生意场上比许多上海商人更精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隔也是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的一种类型。原因在于,即使农民们进城以后的行为方式与在农村时一样,他们也需要作出很大的价值观与行为的调整,因为他们已经处在与农村完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更进一步说,恰恰是大量文化区隔的存在,使当下上海的文化与社会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风格,因此,区隔甚至比融入能更有效地建构上海文化。

三、社会时间、社会空间与文化人格嬗变

文化人格是抽象概念,社会时间和空间既提供了文化人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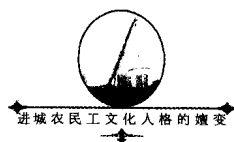
以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展开的基础与可能性,也提供了一条全面理解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的路径。因此,我们对于进城农民工群体的质性研究抓住社会时间、社会空间这两个核心概念。

社会时间建构了村落生活的绵延,这种绵延却以循环的方式展开。村落里的社会时间是自然的,以一年 24 个节气、春夏秋冬的轮回为基调。农民们根据冷暖晴雨安排劳作,组织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村落里的男女老少各司其职,各做其事;年复一年,农民们似乎都过着同样的日子,面对同样的困难。村落里的生活是单调的、简单的、重复的、轮回的。曾经,农民们也沾沾自喜于社会时间中的自由。传统的社会时间边界十分模糊,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更不会有严格规定的劳动指标^①,农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时间。但是,农民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应对烦琐而无休止的劳作;而且,这种劳作的报酬通常难以预期,有时甚至是负数。

村落里的社会时间是神圣的,以传统的节日为标志。清明节、鬼节、春节等传统节日都受到农民们极大的重视,他们在与玉皇大帝、观音娘娘、土地菩萨、灶家菩萨的对话中,体察着流动时间中的永恒、具象事件中的真理,在虔诚地“邀请”祖宗们“回家”喝酒、大把大把地给祖宗们送去钱财的过程中,强调着过去的价值、祖宗的尊严与权力。

现在,农民们离开了村落,城市社会时间冲击着农民们的生命体验。随着外出务工,农民工开始对时间有了新的领悟。但这是否意味着农民工经历了一个从农村时间到城市时间(或“前工业时间”向“工业时间”)规训的线性过程?随着不得不应对劳动分工、

^①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组织生产,农民们需要按时出工,劳动也以工分记录,但是传统的农民们仍然自由散漫,不遵守劳动纪律。



劳动场所的监督,时钟、金钱刺激以及相关的道德训诫和学校体制,是否会形成一种新的时间纪律呢?

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在社会时间中反映的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工并不把工作时间理解为抽象的权利控制机制,而是将社会时间放在工作场所的各种关系中来理解。他们的能动性不在于有组织的抗争,也不在于日常工作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实践策略来反抗、躲闪、歪曲时间的规训,而是让“日子”得以过下去。他们通过工作场所的社会关系重新创造工作场所的时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对城市社会时间的不同理解,以及采取的不同行动。部分农民工在农村“自由惯了”,他们不喜欢工厂中严格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纪律,千方百计地自己去“做生意”。有些人成功了,他们在城市中,既享受着在农村时一样的“自由”,又赚着钱。当一些人在网上开店的时候,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工业时间,而走向了后工业时代?

另一些进城农民工不仅接受了工业时间,还从中发现了区别于农村的自由。一位来自四川的打工者说,“我们一年到头种水稻、花生、玉米、小麦、蚕豆,一年也没得歇。这个活(建筑工地上做工)单纯一些,在家要喂猪、喂羊、喂鸡。家里来了个人,你要接待,还要跑到街上去买个蛋、肉什么的”。另一位返乡女工说,“在外面打工单纯些,你做完工回到寝室就随你做什么。在家里不行,一会是田里地里的事情,一会家里要做饭打扫收拾,我还宁愿在外面”。在很多进城农民工看来,“农村绝非一个浪漫的场所,非机械化的农业并非是与自然的亲近,而是无休止的农活”。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的经历放在农业生产与城市打工的对比之中,我们更加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在现代工作时间的发现更多的自由。在很多农民工看来,农业生产就像一次有风